

阜阳地区党史资料

(第十七期)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专 辑

中共阜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8
1985

阜阳地区党史资料

(第十七期)

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版

目 录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感怀·····	地委书记陈复东 (1)
阜阳地区军民抗日情况概述·····	地委党史办 (2)
少奇同志要我们“安家”·····	肖望东 周茂芹 (6)
拂晓，拂晓，金鸡报晓 ——记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建立前后几件事·····	高维进 (9)
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	王如良 (13)
简述新四军四师在路西的形成与发展·····	任大成 (20)
我党在国统区皖北临泉的地位和作用·····	陈忠志 (29)
余亚农与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	薛 史 (34)
督察专员郭造勋与阜阳抗日运动·····	张振标 (37)
略述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工作·····	慕占民 (41)
略述阜阳地区抗日动委会及其工作团·····	徐荷珍 (46)
爱国将领周元与蒙城守土抗战·····	王襄天 (52)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发展阶段及其区域范围初探·····	童天星 戎毓明 (53)

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

志 懷

陳毅東

芦沟橋頭戰雲飄，

腥風血雨弥赤县。

策馬御敵太行怒，

按劍驅寇松花寒。

气吞万里复华夏，

威震五洲唱凱旋。

瀋海桑田從是後，

干戈玉帛是境遷。

阜阳地区军民抗日斗争情况概述

地委党史办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胜利四十周年了。值此之际，回顾阜阳地区军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将具有重要意义。

淮北抗日根据地是我党领导下的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而涡北抗日根据地和阜阳地区（国统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英雄的阜阳地区军民前仆后继，团结战斗，英勇顽强，排除万难，有力地配合全国各抗日战场，与日、伪、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一、芦沟桥事变后，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各界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

一九三八年春、夏，蚌埠、徐州、开封先后失守，我区蒙城、涡阳、亳县和颍、凤沿淮地区相继沦陷。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五月二十四日，日寇飞机对阜阳狂轰滥炸，致使阜阳城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死伤无数，惨不忍睹。

阜阳人民面对这一现实，更加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的不满。广大人民群众和许多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响遍城镇乡村，尤其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一大批青年，前往延安寻求救国真理。在我秘密党的推动下，各县都成立了“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抗日工作团和青抗会、农抗会、妇抗会、商抗会等抗日团体，迅速在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以多种形式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军队在前方浴血抗战的胜利消息，揭露抗日阵营内妥协投降的危险，鼓舞抗日救亡的热情，提高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组织群众进行募捐和慰问从前线归来的伤病员，有力地推动了阜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工作第一队（政一队）进驻阜

阳，全队七十多人，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当时影响较大。中共皖北特委主要利用“政一队”的合法地位，以“政一队”的党组织为骨干，积极开展皖北各县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政一队”派往各县的指导员，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举办保甲长训练班、抗日动员训练班，进行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教育。“政一队”办有《淮流》刊物，主要宣传我党关于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当时，成为皖北很有影响的刊物。

二、抗日战争初期，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和著名人士，积极拥护我党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奋起抵抗日寇的侵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寇进攻徐州，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七三师中将副师长周元奉李宗仁之命，率一零三三团两千名官兵，开赴蒙城设防。五月七日，日军井关机械化部队四千多人，在二十多架飞机配合下，以强大火力猛攻县城，周元师长身先士卒，率部反击，经过三昼夜的浴血奋战，打退了日寇的多次进攻，毙伤日军两千余人，终因孤军无援，周元师长和全团将士，除二十一人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八年春，成立了以爱国将领余亚农为总指挥的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军。由于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纷纷投军抗敌，队伍很快发展到六、七千人，下分三个支队，驻守亳县、涡阳、太和、临泉一带。我党派王少庸、程坤源、许道奇、刘坛奎、王振鸿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进行统战工作。余部在我党的帮助下，对抵抗日寇的侵略，安定社会秩序，动员和支持各界人民的抗日活动起到很大作用；对支援我军开辟皖北抗日根据地，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冬，颍上的杨席清受爱国将领冯玉祥的派遣，在南照集一带成立第三十四游击纵队，杨任司令，刘峙雄任副司令。到三八年上半年，队伍发展到两千多人。同年八月，在正阳关与潮淮西上的日寇遭遇，进行激战，毙伤敌一百多人。因敌人炮火过猛，加之水上作战，伤亡四、五百人，大部逃散，最后只剩一百多人，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截击，全部被歼，杨席清等人牺牲。

阜阳督察专员郭造勋，也是一位爱国的进步人士。他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支持民众的抗日活动，和我新四军游击支队保持友好的统战关系。他为适应阜阳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八年底，以“培养抗日救亡和建设人才”为宗旨，在阜阳创办了“抗战中学”，请著名爱国人士任崇高为教务主任。其教学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列入了学习课程。抗战中学还组织了乡村工作队，分批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使阜阳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皖北特委机关设在抗战中学，一度成为我党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三、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彭雪枫同志遵照党中央“进入敌后，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河南竹沟挥师东进，开辟豫皖边抗日根据地。

支队抵达西华杜岗后，与“第三支队”和“肖大队”汇合，整编为三个大队共一千零二十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张震任参谋长。十月二十七日，游击支队渡新黄河东进，首战窦楼，再战西陵寺、陈寨、

宋庄，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进入亳、永县境。一月八日，游击支队在亳北芦家庙袭击企图进犯亳县之敌，歼敌一百多人，俘敌二百多人，并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芦家庙首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区军民抗战的信心，初步打开了豫皖边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涡北以后，积极打击日伪军，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并整顿社会秩序，大力发展主力军和人民武装，建立地方政权。一九三九年五月，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开辟宿、蒙、怀、凤地区，并于九月，回师涡北新兴集。游击支队在日、伪、顽犬牙交错的险峻环境中，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使涡北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全支队有三个主力团、六个简编团，连同地方武装共一万二千余人。十一月游击支队奉命改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于此同时，地方党政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先后建立了永城、夏邑、肖县、宿县、亳北五个县政权，广泛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至一九三九年末，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并展开了全面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到涡北新兴集检查工作，充分肯定了六支队的成绩，提出了要集中力量创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主力部队，加强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党，改造和建立地方政权等问题。为部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零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第六支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根据敌伪顽行动的基本特点，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以制止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逆流，打击和粉碎了敌伪顽的进攻。其中著名的有“四一”战斗，“六一”战斗，板桥战斗。“六一”战斗，粉碎了日寇分数路对我党政军驻地——新兴集的袭击。板桥战斗，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伪千余人，粉碎了敌伪对我涡、蒙地区的“扫荡”。从开辟豫皖边以来，六支队在我地方武装的配合和人民的支援下，进行了数十次较大的战斗，共毙伤俘日伪顽军二万零四百多人，缴获各种武器八千多件，从而巩固和扩大了豫皖苏根据地。到一九四零年七月，六支队连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一万九千五百余人，为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在淮北抗日斗争中，被誉为彭师长三件宝的《拂晓报》、拂晓剧团和骑兵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六支队改名为新四军四师，进行了艰苦的三个月的反顽斗争，虽然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但也遭受较大的损失。遵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为照顾抗战大局，我四师主力和地方党政军干部，于五月间分批撤离路西，转移到皖东北地区，我艰苦创建的路西抗日根据地随陷入敌手。

四、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创建豫皖边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十分重视地方党政军的建设。

一九三九年一月，豫皖边省委在书案店成立，书记张爱萍、副书记吴芝圃，并抽调党员干部，到皖北各县开展党的工作。五月，派周季方到阜阳组建皖北特委，辖阜、临、太、涡、亳、蒙、寿、凤、怀等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国统区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到三九年秋，亳县、阜阳、蒙城、凤台、太和、临泉等县委都先后

建立起来。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国统区暴露身份的党员，先后撤到涡北根据地，皖北特委撤销，在临泉成立了阜临太中心县委，书记李轩，领导豫皖边界各县地下党的斗争。

为进一步加强地方党政建设，三九年十月，边区省委改为豫皖苏区党委，吴芝圃任书记，并建立了“豫皖苏边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我区亳、涡、蒙、凤，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地方武装，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和扩大工、农、青、妇、儿童团、老人指导团等群众组织，党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四零年春，区党委决定，在新兴集重建皖北特委，书记吴浩，负责涡北根据地和涡南国统区各县党的工作。同年八月，区党委决定在临泉建立豫皖特委，吴浩任书记，负责豫皖边界十余县地下党的工作。因管辖面积过大，不便领导，又于年底划分为皖北、豫南两个地委，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二年夏季。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四零年八月，皖北特委撤消，成立了皖北地委，淮上地委和路南地委。皖北地委书记，由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兼任，后赵文甫，辖涡阳、亳县、宿西；淮上地委书记李丰平，辖蒙城、凤台、怀远、宿东四个县。同年十二月，皖北地委撤消，成立了涡浍地委，书记谢帮治。四一年五月，三个月反顽斗争失利，四师主力转移路东后，涡、蒙、亳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坚持了长达三年的地下斗争。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新四军四师回师津浦路西，连战获胜，很快恢复了豫皖边抗日根据地。同年十一月，成立了淮北二地委，领导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工作，很快恢复了涡北地区八个县、五十三个区和三百一十五个乡政权，组建了八个县总队及三个独立团，发展民兵近万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我四师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支持下，粉碎了日伪顽“扫荡”。一九四五年以来，涡北军民积极配合全国各解放区的反攻，主动出击，先后进行了代集战斗，青町战斗，板桥袭击和宿西南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歼灭日伪顽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阜阳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阜阳地区军民对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让我们继续发扬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投入到当前改革的洪流中去，为振兴中华，建设阜阳而努力奋斗！

少奇同志要我们“安家”

肖望东 周茂芹

座落在淮北平原上的新兴集，原名灵奶庙。它位于安徽省涡阳县北部，南临涡河，北邻永城，地处豫皖交界，一九三九年以来一直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六支队的前身）所在地。司令兼政委彭雪枫，副司令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我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部队发展很快，到九月份约有三千多人了。但支队还没有比较巩固、安定的“家”，没有建立抗日政权，故在经济上很困难，快到冬天了，部队连很简单的伙食都开支不了，虽在书案店卖了马，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此，我们都很着急。一天，彭雪枫同志对我们说，今年的冬季快要到了，三千人的棉军装至今尚无着落，需要十万块钱购制，没有十万块钱是过不了冬的。我向中央要了，中央说各地都如此，要我们自己想办法，我看是否可以叫刘贯一同志到“国统区”想想办法募捐去？如能搞到一万块钱，再配合其它办法，大家就能渡过难关了。当时，我们都同意他这个想法。随后，彭雪枫和刘贯一谈了募捐的事，刘对此慨然应允，便出发了。刘贯一同志募捐回来后向支队负责同志作了汇报。他向大家说：“他先到郑州找孙桐萱，孙很慷慨，当场表示捐助五千元钱。我辞别孙后，又转到洛阳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求援，碰了个‘钉子’。后我又转到晋南垣曲县，通过关系找另一杂牌军刘茂恩军长，他胆子很小，根本不敢见我。所以，后边两处都失败了，我就回到豫西渑池县八路军兵站。正好刘少奇同志由延安到达此地。少奇同志和我是老熟人，一九三六年冬他在天津任华北局书记时，我那时在张家口任察哈尔省联络局书记。我是在天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时认识的。这次在渑池相见，他问起我们支队的情况，就向我传达中央要在敌后普遍建立抗日政权的指示，他说靠募捐是不行的，你停止吧，非在敌后普遍建立抗日政权才能解决‘财路’。当然，此政权性质是属于‘三三制’政权，也就是统一战线性质的。他要我先回来，他到竹沟后也就很快会到六支队。并说要我回来后，关于建立抗日政权的意见可先向六支队负责人传达一下。”彭雪枫同志听了刘贯一同志的汇报后说：“那好，建立政权我们就有钱了。”六支队负责人听了刘贯一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后，第一件事就抓建立政权，首先建立了永城政权，先建立永城三区，派张辑吾当区长，后来徐风笑当永城县县长。这样，六支队建立抗日政权，在新四军以及华中整个地区来说，都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首先得到中央指示信息的。特别是彭雪枫是很注意政治情况的，他对中央的政治动向执行是很快的。

不多几天，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便由竹沟来到了六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新兴集。少奇同志拴下汗溜溜的军马后，顾不上休息，便要求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向他汇

报工作。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带着兴奋、紧张的神情走进少奇同志住的屋里，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工作进行的情况和问题。少奇同志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支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扩大，证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进军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了毛主席说的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少奇同志了解情况是很深入细致的。他除了听取支队领导人的汇报，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几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基层干部、有战士、也有农协会员。少奇同志还约了不少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广泛地向干部战士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向敌后发展、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和政策。

少奇同志到六支队后，召开了军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在敌后建立政权的指示。少奇同志着重指出为什么要建立政权？怎样建立政权？他指示说：要抗战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光靠上级接济不行，光靠向富户借粮和“打资敌”（没收向敌区卖粮贩子的粮食）过日子不行，光靠统一战线募捐更不行。少奇同志指出：“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这是中国目前所要做的相互联结的两件大事。”要彻底完成这两大任务，必须在革命中及革命后建立起“革命各阶级的联合的民主政权。”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处于抗日战争阶段，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就必须建立起“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即抗日民主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也就不能长期坚持敌后抗战，最有力的打击敌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刘少奇同志讲：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是革命发展的必然；不仅为党领导人民武装抗日求得民族解放所必需，而且是与国民党争天下谋求人民解放所必要，当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可轻易放过，否则会受历史的惩罚。他指出：在华中要肃清王明机会主义的影响，所谓“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为人家整顿保甲，结果是自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被人家赶出来。少奇同志批评了支队领导干部只管打仗和发展武装，不重视地方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缺点，谆谆教诲说，你们部队发展起来了，地区扩大了，但是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应赶快建立地方政权。接着，少奇同志说：发动群众是建立政权的基础，是扩充军队和克服目前经济困难的关键。我们的军队和政权，国民党承认不承认不要管它，只要人民承认我们就可以存在，我们就可以抗战；我们就可以胜利，也不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少奇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发动群众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同时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各级农、青、妇抗日救国会，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我当时作记录，感受特别深，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确实说到了我们心坎里，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

为贯彻少奇同志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彭雪枫、吴芝圃、刘瑞龙等同志，拟定了地方工作要点，决定先在永城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的试点，尔后总结经验全面推广。按照少奇同志的要求，从部队抽调大批的干部，帮助根据地

各县自下而上普遍建立了农抗会、妇救会、青抗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为了繁荣边区经济，减轻人民负担，边区联防委员会发行了抗币，我军在新集一带开设了工厂、医院、商店和其它服务性行业。四零年春，在彭雪枫同志倡导下，边区党委和边区联防委员会发动、组织了万人民工，和支队共同开挖了一条从永城县李寨经涡阳县新兴集流入淝河的新四沟。

随着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发挥了巨大的抗日救国的热忱。他们努力生产，支援前线，宁愿自己节衣缩食，积极向军队缴送大批军粮、军鞋等军需物资。大批青年农民报名参军，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参战的模范事迹大量涌现，保证了我军的兵力补充和迅猛扩军。至四零年六月，六支队已发展成为拥有三个团和四个总队，共一万九千多人枪的强大的游击兵团。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发展也很快，各县均建立了县大队或自卫独立团，整个根据地成立了保安司令部，辖宿、永、睢杞三个独立团和亳北独立大队，地方武装队伍总计达两万人。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底，豫皖边省委正式改为豫皖苏区党委，充实健全了机构。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刘瑞龙（后由向明，周季方继任），组织部长周季方、宣传部长曹荻秋、民运部长向明（后为谢帮治）、保卫部长黄赤坡，区党委委员有彭雪枫、张震、肖望东、岳夏等人。

与此同时建立了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吴芝圃；副主任刘光光；民政处长雷明、教育处长孙百川、建设处长胡晓初、司法处长徐风笑。四零年初又建立了边区各界军政促进会和参议会，建立了税收机构。联防委员会举办了行政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大批干部分配各地参加政权建设。

从三九年底至四零年秋，我们迅速在肖县、永城、宿县、夏邑、涡阳、蒙城、亳县、怀远、凤台、睢州、杞县、太康、淮阳、砀南共十四个县（这些县均已建立县委）建立了县政权（在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县政权叫县政府，在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县政权有的叫办事处，有的叫抗联会），所辖人口达四百三十万以上。

少奇同志在六支队的生活作风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他身穿一套灰色的棉布衣服。住在一间平时长工住的简陋土墙草房里。我考虑到少奇同志工作紧张，而且早知道他胃病严重，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吃点干馒头，于是我便从部队里弄来些米、面给他吃，可他指示我把部队为照顾他的健康送来的米面送到部队食堂里去，他仍坚持和我们一起吃蚕豆、豌豆、红芋饭。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少奇同志忘我地夜以继日的工作着，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有时甚至通宵不睡，他时而出席会议，时而约人谈话，时而伏案看材料或写东西，时而踱步沉思运筹……他总是精神乐观，鼓励周围的同志，不要怕生活苦，生活苦是暂时的，将来情况会好转。我们开辟根据地，到了一个地方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生产，和群众同甘共苦。只有这样经济困难才能克服，群众也才会拥护我们。

少奇同志在六支队住了虽然不到二十天，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前往淮南抗日根据地，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一军党史办供稿）

拂晓、拂晓、金鸡报晓

——记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建立前后的几件事

高 维 进

新四军四师的拂晓剧团曾活跃在豫、皖、苏一带敌人后方的抗日前线，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是一支年轻的文艺轻骑兵。在他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在那里工作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到敌人后方

要介绍拂晓剧团，先得谈谈四师的创立人彭雪枫同志及其部队的简略情况。新四军四师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命名的。它的前身是新四军游击支队，也叫过六支队。一九三八年九月底彭雪枫同志率领一支三百余人的小小队伍从河南竹沟出发向豫东皖北前进，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根据地，拯救被国民党丢失、为日伪所占领的大片国土上的人民于水火。当时正当徐州失守，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国民党地方政府瓦解，土匪蜂起，地方上极度混乱之时。彭支队过了黄泛区在淮阳县唐棣集首战日寇取得胜利，打死了一名日军骑兵小队队长，打响了豫、皖、苏抗日的第一仗，使日本侵略军在豫东受到了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次挫伤。

彭雪枫同志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将领，他治军很严，又是文武双全，能写文章，很能讲道理，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干部，又很注重宣传教育工作。在支队从竹沟出发时，政治部的宣传部下边办起《拂晓报》作为向部队进行教育和宣传群众的工具，他对每期的报纸从内容到编排都要亲自过目，还经常写文章和写社论。宣传部下还有一个叫青年先锋队的宣传队，经常有二十人左右，唱歌、演戏、写标语，为部队作宣传鼓动工作和到驻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亡，保国家、打鬼子以及号召参加新四军。彭雪枫同志很注意宣传工作的情况和变化，当我们向豫东挺进时，从淮阳以北过了黄泛区，一天清晨，我们正在唱“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子，在房子的墙上也写着“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彭雪枫同志来了，他问我们写的标语和唱的歌子有没有错？我们看了看答道没有错呀。他问这里是我们的后方还是敌人的后方？我们正在思考着，他说这两天我们淌过没腰深的黄水，又走过没膝的泥泞，这是过了国民党在花园口扒开黄河、企图阻挡日本人的黄泛区。其实，日本人没有挡住，倒淹没了多少良田，使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黄泛区以东就是敌占区了，我们在这儿是敌占区的寒楼，你们的标语口号不合适了。我们才恍然大悟，这已经是到了敌人后方。他继续说，作宣传工作要随时注意情况的变化而提不同的口号，不能不顾环

境、条件，一成不变的讲你们准备好的一套。彭雪枫同志的亲切教诲我至今难忘。

二、拂晓剧团的建立

青先队的人员流动性很大，不断有新的人进来而老人员又去充实连队工作，它像个考察干部和训练干部的培训班和储备所。所以彭雪枫同志建立一个专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剧团。

部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从鹿邑西回，北上睢、杞、太时，到了杞县的转楼，有一些杞县大同中学和其他学校的同学参加到部队里来，根据彭雪枫同志的指示，政治部从中挑选了张国安、赵克让、杨居人、杨迎春、李允端等十来个聪明活泼的孩子组成拂晓剧团。调青先队的王挺同志来当班长，由从北平刚来不久，原是学医的女同志左奇担任剧团主任。第一批团员是些十一岁至十五岁的男孩子。剧团建立在紧张的行军途中，还不能进行什么训练的排演，只是唱唱歌，在召开群众大会时配合青先队作些口头宣传。十二月部队到白马驿休整和过新年时，是剧团最初的整顿时期，当时从延安来一批干部中有一位做青年工作的吴同志曾在红军的剧社当过跳舞演员，他将红军剧社中的海、陆、空军舞、机械舞、农民丰收舞等作为第一批舞台节目教给剧团的孩子们。我们还以这些舞台作借鉴又编出一些节目，花灯舞是一个常演节目。在纸糊的花灯上，可以根据晚会的主题，随时变换字样。如庆祝胜利，欢迎某××。……一九三九年八月在曹市集召开党代表大会时，第一个花灯舞就是“庆祝支队党代会召开”的字样。这就把每次晚会的意义鲜明的突出出来。

最初的两个月剧团只有男孩子，后来把马秉书、李运芳、王雨琴等女孩子调来剧团，支队到河南、安徽交界的书案店时，又从阜阳来的学生中挑选张鄂媛（女）张自立、张克让、王大同等参加剧团。三月，左奇同志到卫生部去工作了，把我从青先队调到剧团负责，这时剧团有二十来个十一岁至十八岁的男女孩子，从此到一九四零年四月，我和这群天真活泼、勤奋好学的孩子们一起，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眼看着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

三、拂晓，拂晓，金鸡报晓

彭支队在敌人后方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只能靠打胜仗的缴获，又不能增加群众的负担，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在书案店时，每天吃烂红薯、高粮糊，剧团的孩子们看到彭司令员也和大家一起这么吃，所以从来没有人叫过苦。每天学唱、学跳，还下连队教歌和不断有演出。没有化装油彩，只有锅烟子画眉毛，红药水擦脸旦，棉花粘胡子。服装到处借。后来连队缴获的钢盔、军刀、军大衣不断充实着剧团的装备。戏台是村里的土堆或几辆大车铺上门板，就是还没有幕布。后来南下颍上时，缴获的物资中有两匹绿绸子，彭司令员让供给部给了拂晓剧团，作一副漂亮的前幕，在幕布的下角设计了一个引吭高歌的公鸡，由剧团的女同志用黄布剪了图案绣在幕布上。金鸡报晓，从此剧团有了自己的幕布和标志。雪枫同志曾解释过：拂晓，代表着朝气，代表着希

望和进取，金鸡报晓意思是迎接胜利的曙光。

我们最初的乐队只有拂晓报社的阿乐同志和一把二胡。他把胡琴一拉，《送情郎》的民歌总是第一个节目。“……军号响，总司令来，说不了那知心话……。”一遍又一遍的唱着，群众围拢来了。人到的差不多时，群众大会就可以开始。

除掉唱歌、跳舞，我们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游击队的母亲》等剧目。不久雪枫同志说，要编一些配合当前斗争的，写我们自己活动的戏，向群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同时揭露日伪汉奸的罪行，教育群众和部队。我们就自己编写剧目了。最早演出的是宣传科长王子光编写的《打鬼子》，还有我编写的《参加新四军》。《打鬼子》写一个狂妄的日本军人残酷枪杀某村镇居民，群众恨之入骨。报信给我游击队，结果被我军抓获，消灭了这个日军小队的故事。彭司令员看后夸奖他们戏演得不错，说能激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还说以后演戏一定要注意让群众看得懂，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参加新四军》是写群众不堪日军的烧杀和汉奸伪军的抢劫，但不知该怎办，新四军打走了日军、活捉了汉奸，给群众指出了参加新四军拿枪打日军的出路，于是青年群众踊跃参军。这个戏演出后常常当场就有青年农民受启发而参军的。对当时的扩大部队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挺常演日本人，“八格哑鲁”不离口，张鄂媛女扮男表演汉奸，都是很出色的演员。

当我们一九三九年夏初，部队往颍上去时，路过一个记不得名的小镇，这里有个很大的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个唱诗班，使学生和一些农民唱的宗教歌曲，男女四部合唱，非常动听，比我们剧团唱得好，孩子们很羡慕。正好这时候从大后方来的陈守川同志作了剧团的艺术指导，教唱歌。《太行山上》、《新四军军歌》等原来我们只会齐唱，他就教我们分声部合唱，同时教孩子们试唱、练习、乐理，提高了大家的音乐水平。我们也教当地唱诗班唱抗日歌曲，在群众大会上他们还和我们同台演唱，彭雪枫同志很注意团结各阶层愿意抗日的人士，每到一地他都要亲自向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也常教育我们要作团结教育工作，所以剧团有时作了他的助手。在一九四零年初任泊生同志在涡阳联络处时，曾要我们到涡阳南边国民党驻军中去演出，虽然都是歌舞和小节目，但是能到友军中去演出就代表我新四军团结友军的愿望。我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新编九一八小调》、《松花江上》等，使东北籍的士兵悲伤、义愤，台上、台下感情交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不绝于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和起了很好的影响。

当一九三九年秋部队到新兴集后，有了一段较长的驻扎。这里有一个礼堂，有舞台，也有了汽灯等设备。在延安鲁艺学习过戏剧的苏理同志来到剧团担任导演，他带来一些延安的剧本。宣传部的老余、单斐、李克羽等同志和剧团一起，演出了几台大戏。一个三幕话剧《冀东起义》，反映八路军争取伪军起义，共同打日本的一个独幕剧《三江好》，反映九一八后东北人民义勇军战士的勇敢抗日。还演了三幕歌剧《农村曲》，反映一个农村妇女送丈夫参军打日本的故事。这时已不只阿乐的一把二胡。而是有了几件象样的乐器和一个小小的乐队了。这些戏都很受群众欢迎。剧团的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这时还把部队里爱好京剧的同志组织起来，业余排练了传统戏《打渔杀家》、《法门寺》等。司令部的参谋刘端珊是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在新兴集时，徐海东同志路过彭支队驻地，只有一天时间编写了一段京剧《徐大将粉碎日寇扫荡》在晚会上演出。锣鼓声中扮演徐海东的演员撩战袍、舞战刀、自报家门：“我乃徐海东是也，湖北人氏，窑工出身……”看戏的徐海东同志和陪同的彭雪枫同志都哈哈大笑。徐海东同志称赞演得好。说彭雪枫同志的“彭家班”真是名不虚传哩！“彭家班”是群众喜欢拂晓剧团，对它的美称。晚会上，配合形势和任务，现编、现排，及时演出，及时宣传，是我们剧团的好传统。

四、在彭雪枫同志关怀下成长

拂晓剧团的孩子们在政治上、生活上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行军时彭雪枫同志的马就常驮着剧团的小同志。驻军时，他常到剧团的住处来看望孩子们，问他们看拂晓报没有？把孩子们的日记本拿来看看记得怎样，对错别字或不通顺的句子就为他们改正，常常和孩子们谈得非常亲切。有一次他说要进行一次时事测验。孩子们到他的住处围座在他周围，他提出一些问题，孩子们有的答得出，有的答不出。有的孩子说拂晓报上看到过，但看过又忘了。雪枫同志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着，整整半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从国际形势谈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革命的前途谈到革命的责任心……他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说多学点本领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工作有各种各样，有文有武，要学得文武双全。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事情就一定要学好。于是孩子们学习兴趣更浓，学习得更努力了。常互相勉励：可要好好用功，别辜负司令员的期望，别让司令员问住了。

有一个时候许多孩子生虱子、长疥疮、发疟疾，彭雪枫同志听说后就督促我们带孩子们到卫生队去看病，并要他们给些有效的药。还要我们烧开水为孩子们烫衣服，常烧些热水为孩子们勤洗澡。并说要孩子们赶快恢复健康。这么小的年纪参加革命队伍，我们应该好好爱护他们，照顾他们。从颖上北回新兴集的路上，小团员王雨琴得急病去世，追悼会上彭雪枫同志难过地说：“小小孩子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参加革命，部队就是他们的家，领导同志就该象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王雨琴竟得病不能治好，这是我们没有照顾好她，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孩子们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中，在彭雪枫同志的关怀下，政治上、业务上都健康的成长。剧团以后不断壮大，四师的战士中有这么几句顺口溜。彭师长有三件宝，骑兵团、拂晓剧团，还有一张拂晓报。听说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拂晓剧团和前线剧团合并为华中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后来又合并到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随着百万雄师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至今在剧团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已成为党的各方面的干部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陆军第二十一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供稿

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

中共阜阳县委党史办 王如良

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江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我们党创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它南扼长江，北倚陇海铁路，是连接山东、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又是控制南北交通干线津浦路、京汉路及近海交通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战初期，国民党顽固派被迫抗日，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以致大军迅速陷于溃败，先后丧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国土。一九三八年二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开始向皖南集中时，日寇已占领了上海、南京一带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对江南地区的广大农村尚无力控制，这正是我军迅速东进敌后，开始抗日游击战争的大好时机。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向我党长江局、东南分局、新四军和苏、浙、皖、赣、鄂、豫省委接连下达重要指示：要抓紧有利时机，积极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正确路线受到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抵制。王明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抗战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因此，当时不仅整个华中的抗日工作不是从积极地深入敌后打算，就是新四军的几支抗日游击部队，除一部分深入苏南、苏北、皖东北敌后外，其余也徘徊于敌寇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带，而不积极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日渐推行“防共”“溶共”“限共”的反动政策，使我党领导的各个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严重考验，处于敌顽夹击之下，我游击战争形势十分险恶。

在这个危急关头，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要战略方针，撤消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中原局的成立，对于创建和发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刘少奇肩负着领导华中敌后抗战，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从延安来到河南，直到一九四二年三月奉调回延安党中央工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他辗转津浦路东西两侧，走遍皖东北、皖东、苏北、苏中根据地，先后与中

原局主要干部朱理治、陈少敏、曹荻秋以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分别进行了座谈，深入调查研究，召开干部会议，分析了华中抗战形势，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研究贯彻了党中央“发展华中”方针的具体方案，胜利完成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华中地区的形势，统一了华中领导干部的认识。

华中地区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缺乏调查研究，因而对华中全盘情况和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了解很不深入，不系统。而领导干部中对形势估计上的许多模糊认识，显然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刘少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中原局、新四军六支队和江北指挥部等会议上，就几年来华中工作做了总结，围绕抗日战争中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指出这条错误路线给华中带来的危害。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华中的形势。他指出，华中北联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既可与其联成一片，又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三种力量（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三种地区（敌占区、国统区、我们占领区）。我们要坚持持久抗战，就要削弱敌伪力量，缩小敌占区；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扩大我占区。为此，我们就必须冲破国民党的阻力，深入敌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刘少奇向党中央发了一个长电，对华中发展的希望提出了建议，建议指出，目前整个华中有很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豫皖李先念部活动的地区；二是豫东彭雪枫部活动的地区；三是最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苏北，应集中大力发展。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在定远县召开的中原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具体解释了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任务。指出，豫皖苏边区和淮南地区都是面向敌伪，背靠顽军，如果我们向西发展，将会与国民党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抵制，而且也易于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失利。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那里敌顽一贯勾结，破坏抗战，早已为广大人民所切齿。况其孤悬敌后，国民党增援也十分困难，因此我军向东发展既有理，也有利。向东发展，建立以淮北、苏北为中心的华中根据地。他又指示，江北部队要冲破一切阻力向东发展；淮南我军应坚持津浦路西，发展路东。

为了统一干部的认识，刘少奇还批判了“华中特殊论”，为我军向敌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抗战以来，有些同志强调“情况特殊”，丧失了时机，压抑了人民力量的发展。他说，哪一个地区都有它的特点，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有“特性”。但是各个地区还有一个“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在日寇的武装进攻和武装占领下，都有敌人汉奸，伪政权，我们就可以打进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只提“特性”而忽视“共性”，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正确指示是错误的。

刘少奇的这些分析统一了华中领导干部的认识，提高了他们贯彻党中央关于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的自觉性。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一九四零年八月，黄克诚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转战到皖东北，在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十月，新四军和八路军在盐城会师，打开了苏北、淮北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标

志了华北（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这对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打击日伪，制止顽固派的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端正了华中党的领导工作路线，开创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新局面。

一、开创了群众运动工作的新局面

在刘少奇未到达之前，群众工作是薄弱的，有些领导同志由于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不懂得依靠群众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当时华中地区流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口号，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扩充自己的实力，丧失了向敌后发展的大好时机。

刘少奇到达华中后，响亮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的口号。一九三九年十月，刘少奇在检查新四军六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工作时，他针对群众工作还停留于一般的宣传号召，提出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实行合理负担，组织与武装群众。

他还针对当时一种口号“帮助国民党第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提出严肃的批评。引用了《孔子家语·贤君》中“徙宅忘妻”的故事，一个人健忘，搬家时把自己的妻子忘掉了。他说，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比这还要严重，不仅把妻子，而且连自己都忘掉了。为什么自己不去建立根据地，而要帮助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呢？

在华中敌后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作为坚持抗战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刘少奇一贯强调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他认为，只要把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放手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抗日的潜在力量；才能削弱和打破封建势力在农村的统治，动摇敌伪顽的社会基础，才能通过发动起来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去改造基层政权。

华中当时有的地方把减租减息，当作宣传口号，久未动手实行，有的地方是明减暗不减，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地主夺田索债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指出，必须切实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真正改善群众生活，解除群众疾苦。一九三九年他到江北不久，即指示邓子恢等同志草拟一个发动群众的纲领，提出了“三七分租”、“半分减息”、“废除旧债”等口号，并规定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成立人民抗日政府等办法，作为当时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的行动纲领。调派一千多名干部深入淮南各县农村，发动减租减息的斗争。他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群众运动的三个原则：要尊重和发动群众的自动性去组织群众；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去组织群众，要采取多种形式去组织群众。

在刘少奇的启发和帮助下，华中地区的领导干部提高了认识，并且很快地行动起来。他们深入群众，做艰苦耐心的教育和发动工作，从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日常生活困难入手，和群众打成一片，以取得群众对党的依赖。

由于减租减息运动相继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从而加强了华中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对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起了巨大的作用，华中地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不仅乡区县都相继成立了工、农、青、妇各系统的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儿童团，而且各地区还在工农青妇各自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了地区的统一组织。到一九四二年，华中各地